

# 大学多样资本:基本类型、相互转换及意义

胡钦晓\*

〔摘要〕 伴随全球范围内政府对高等教育资助份额的减少,大学应充分调动自身多样资本,促进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坚持以学术为业。大学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大学多样资本转换具有连贯积累性、增殖性、成本耗散性和价值多样性,大学多样资本转换的途径包括再生产和继承、交换和转让等,大学资本转换的方式包括经济转换和社会转换、直接转换和间接转换、强制转换和诱致转换、内部转换和外部转换等。正是基于多样资本间的不断转换,大学才变得生机勃勃,才能够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关键词〕 大学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学术资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财政出现了明显相似性,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体制不同、高等教育传统不同的国家之间,还是在欧洲大陆型、英国型、美国型或者混合型高等教育体制的国家之间;无论是高等教育精英型还是普及化,是公立为主还是私立为主的国家之间,其高校财政都面临着共同危机:政府公共支出的普遍削减,造成高校经费日益紧张;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造成高校过度拥挤;在绩效管理、市场运作的大潮裹挟下,质量危机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重要话题。<sup>①</sup>为应对多样危机,确保高等教育质量,“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断要求增加基金,但全世界的回答相同:自己靠自己!”<sup>②</sup>

作为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第三组织部门,高等学校完全依靠政府拨款运作的黄金岁月已成明日黄花。我们的追问是,面对普遍性的经费危机,大学凭借什么来“自己靠自己”?在“谁付账谁点唱”的市场逻辑下,大学怎样才能不迷失方向,不丢弃灵魂?在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盛行的当下,大学应当如何在外部诸多利益诱惑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把视野回归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论述中,亦即“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一切形式,而不只是考虑经济理论认可的那一种形式,否则是不可能对社会界的结构和作用加以解释的。”<sup>③</sup>换句话

\*教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273165。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学术资本与大学发展研究”(B14140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美] D.B. 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3—224页。

② [乌拉圭] 朱迪思·苏兹:《大学在生产部门的新任务》, [美] 亨利·埃兹科维茨、[荷] 劳埃特·雷德斯多夫:《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③ [法] 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页。

说,如果要解释当下大学面临的诸多困境,我们就必须在经济资本之外,分析大学其他资本形式。进一步来讲,如果要为当下大学发展冲破困境寻找出路,我们绝不能仅仅关注大学的经济资本,还要关注大学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等。

## 一、大学多样资本的基本类型

自人力资本突破传统的物质资本单一形态后,资本的形式日益向多样性不断拓展,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学术资本等概念相继进入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资本的多样性,为我们研究大学资本开拓了广阔空间。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样资本形态,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抽离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类型进行分析。针对大学组织,我们在研究其资本多样性时,将沿着布迪厄的思路,着重分析大学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结合大学组织特色,分析大学的学术资本。

1. 大学经济资本。所谓经济资本,“包含了我们经常说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等。它是基础性的资本类型,其它类型的资本首先都被看成是经济资本,后来才从经济资本中分离出来,如目前获得广泛认同的人力资本,以及正在获得广泛研究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都是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sup>①</sup>可见,在众多资本类型中,经济资本是最为基础的资本类型,其他资本类型必须具备经济资本的可交换性、能够带来价值增殖性等基本特征,才能够称之为资本。

按照经济资本的分类,大学经济资本可以划分为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大学物质资本主要是指校园建筑、校园占地、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能够为大学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等提供条件的具体有形物品的集合。大学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大学所处自然环境中所拥有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汇总,譬如,一所大学校址是处于城市,还是处于乡村;是处于沿海,还是处于内地,直接关系到大学师生的衣、食、住、行、医的质量,并进而关乎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大学金融资本主要是指大学所拥有的现金、基金、股份、债券等,以及这些资金所产生的直接利润。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2014—2015年预算收入为例,州政府拨款(State Appropriations)2.95亿美元、学费(Student Tuition & Fees)12.78亿美元、联邦政府拨款(Federal Sponsored Programs)7.97亿美元、非政府组织资助(Non-Government Sponsored Programs)1.86亿美元、间接成本回收(Indirect Cost Recovery)2.14亿美元、私人捐赠(Private Gifts & Sponsored Programs)1.21亿美元、投资收入(Income from Investments)2.85亿美元、医学院收入(UM Health System)32.08亿美元、其他收入(Other Auxiliary Units)3.07亿美元、院系收入(Departmental Activities)1.21亿美元,总计年度预算收入(Total Revenues)为66.16亿美元。<sup>②</sup>以上年度收入均可以看作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所拥有的金融资本。

2. 大学社会资本。布迪厄从“场域”(一个力量关系的场所)的概念出发,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与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密不可分。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此外,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Nan Lin)、经济学家格伦·卢里(Glen Loury)、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及国内学者都曾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或组织在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长期交往、合作互惠,进而在形成的一系列互动的网络关系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资源

<sup>①</sup>薛晓源、曹荣湘:《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sup>②</sup>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 “University Financial Profile”, [http://obp.umich.edu/wp-content/uploads/pubdata/facts-figures/finance\\_umaa\\_14-15.pdf](http://obp.umich.edu/wp-content/uploads/pubdata/facts-figures/finance_umaa_14-15.pdf)/2018-2-15.

总和。<sup>①</sup>如果分析社会资本的外延,它可以划分为客观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和主观社会资本(“粘合”关系网络的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

网络关系作为资本是不难理解的。举个极端例子来说,甲是一名百万富翁,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但是社会网络关系封闭;而乙是一文不名者,但是却拥有众多可信赖、关系密切的亿万富翁,这些亿万富翁可以随时为乙的行动支付成本。我们说,尽管从经济资本上乙不如甲,但是从客观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的角度来看,乙要远远胜过甲。但是,这种客观网络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需要条件的:乙尽管一文不名,却非一无所用,否则无法进行长期交往、合作互惠。换句话说,乙在经济上是拮据的,但在政治、文化、学术、声望等方面却拥有丰厚的资本,而且亿万富翁们明白,将千万巨款借贷给乙是无需经过耗费时间、金钱、精力等法律途径,就能收到预期收益的。这就体现出了主观社会资本(诚信、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意义,亦即中国传统中“得千金不如得季布一诺”的价值所在。

按照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将大学社会资本划分为客观社会资本和主观社会资本。与个人社会资本不同,作为组织的大学,其社会资本又可以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外部社会资本决定着大学获取外部资源的范围大小和能力高低。大学外部关系的高度(国家直属、部委直属、省属、市属等)、广度(校友关系、企事业关系、国际化关系等),直接决定着大学获取外部资源的范围。在外部网络关系大致相同时,这些网络关系的深度,譬如熟识度、认可度、美誉度等,则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大学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而熟识度、认可度、美誉度是在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习俗惯例等制约下,长期交往、合作互惠的结果。内部社会资本的运营,对于大学发展同样重要。在内部网络关系稳定的情况下,其自由度、和谐度和认同度等,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学职能发挥和目标实现。一个学术自由压抑、官僚气息浓厚、组织认同低迷的大学,很难具备良性发展的基础。

3. 大学学术资本。早在1979年,布迪厄就明确提出了学术资本的概念,但是相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学术资本的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偏少。英国学者马修·艾迪(Matthew D. Eddy),美国学者布拉德福德·怀特(Bradford R. White)、珍妮佛·普雷斯利(Jennifer B. Presley)和凯伦·迪安杰利斯(Karen J. DeAngelis)等从个体层面对学术资本进行了研究;德国学者布朗(Dietma Braun)、美国学者萨乔万尼(Thomas J. Sergiovanni)、加拿大学者伊斯曼(Julia Antonia Eastman)等则从组织层面对学术资本进行了研究。<sup>②</sup>分析这些成果,不难看出,学术资本主要来源于对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相关研究。一定意义上,学术资本可以看作是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变种,我们可以把学术资本称之为高级智力资本或高深知识资本。与学术资本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带有明显价值倾向性所不同,学术资本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样,是一个中性词汇。

从外延上来看,大学学术资本可以划分为显性学术资本、隐性学术资本和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三种类型。所谓显性学术资本是指那些以实物为载体的、可以通过文字、语言、模型、证书等来精确描述或表达的高深知识资源,譬如论文、著作、发明、专利等;所谓隐性学术资本是指那些以人为载体的,很难通过文字、语言、模型、证书来精确表述或表达,一般情况下需要面对面地交流或熏陶的高深知识资源,譬如学术思想、教学能力、思维模式、创新方法等;所谓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是指那些既可以以实物为载体,也可以以人为载体,通过显性和(或)隐性高深知识的积累、传播、创新、应用等

①胡钦晓:《大学社会资本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35页。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P.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8—23; M.D. Eddy, “Academic capital, postgraduate research and British universities”, *Discour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vol.6, 2006, pp.211—223; B. R. White, et al., *Leveling Up: Narrowing the teacher academic capital gap in Illinois*, Illinois Education Research Council, 2008, pp.9—10; 孙进:《德国大学教授职业行为逻辑的社会学透视与分析》,《北大德国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5—197页;冯大鸣:《沟通与分享:中西教育管理领衔学者世纪汇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J. A. Eastman, “Revenue Gene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Academic Capital, Values and Autonomy: Insights from Canada”,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 Policy*, vol.19, 2007, pp.1—17.

形成的学术声望资源,譬如名师名家、名著名作等。

在大学学术资本的外延中,尽管我们把显性学术资本和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都概括为可视的人或物,但是与隐性学术资本一样,这里仍然强调依附于人或实物的、无形的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正如索托(Hernando de Soto)所强调的那样,“并非任何真实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有形的、可见的。时间是真实的,但只有当它通过钟表或日历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能被有效地加以运用。”<sup>①</sup>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同样是真实的,它只有通过人或实物,并经由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活动表现出来,才能被有效地加以运用。

4. 大学文化资本。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划分为三种形式: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之所以要区别对待,是因为这种形式使得文化资本披上了一层完全原始性的财富面纱。<sup>②</sup>

布迪厄是从微观个体层面对文化资本进行分析的,如果移植到大学组织层面,对大学文化资本进行分类,亦可划分为“具体文化资本”、“客观文化资本”和“体制文化资本”。大学具体文化资本依赖于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存在,主要蕴含于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之中,譬如中国近代大学中的北大之自由、清华之严谨,就是两所大学具体文化资本的各自彰显;大学客观文化资本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譬如大学保存的、带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本或善本图书、绘画、仪器设备等,也包括大学校园内,能够彰显大学文化特色的纪念碑(如哈佛雕像等)、建筑物(如北大红楼等),等等。大学体制文化资本包括经过讨价还价制定的、稳定的、正式的组织 and 规章制度,譬如组织制度中的董事会制度、院系设置制度、教师或学生组织制度等;规章制度中的大学章程、招生制度、教学制度、考试制度、学位授予制度等。这些客观化的制度架构,是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文化存在。这些文化存在,譬如董事会的构成(社会显要的层次、多寡)、大学章程的审批(中央或地方政府)、学位授予的层次(博士、硕士、学士)等,都为大学“披上了一层完全原始性的财富面纱”。

在大学多样资本中,大学文化资本是最为复杂、边界最为模糊的,往往与其它资本类型交叉存在。譬如,在大学具体文化资本中,那些从事高深知识教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既是大学文化资本的载体,同时也是大学学术资本的载体,因为“文化”和“学术”的边界不清,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但是,由于“文化”和“学术”所包含的知识范围和程度不同,因此我们强调文化资本包含的人员要比学术资本更为广泛。再如,在大学客观文化资本中,无论是图书、绘画、仪器设备,还是纪念碑、建筑物等,都属于大学经济资本中物质资本的范畴。但是,我们强调大学客观文化资本特指那些带有历史文化价值或彰显大学文化特色的实物,因此其涵盖范围要比大学物质资本少得多。

## 二、大学多样资本的相互转换

资本之所以能够产生价值,在于资本间的可转换性(包含流通性和交换性)。大学多样资本在转换过程中,其性质、途径和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规律性。

### 1. 大学多样资本转换的性质

(1) 连贯积累性。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

① [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第6页。



界内在规律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博弈区别于简单的碰运气,在转盘赌博当中,前一轮的赌注也许会在每一次新的旋转当中再次失去。这是一个没有连贯性、没有积累性的世界,既无继承权也无固定资产。资本与此则截然不同,它需要时间去积累,需要以客观化、具体化的形式积累。<sup>①</sup>强调资本转换中的连贯积累,就是要强调资本生产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任何一种资本形式的转换和积累,不能寄希望于“一夜暴富”,也不能寄希望于“天上掉馅饼”。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历史悠久的大学往往比新建高校具有更多各类资本,实质上就说明了资本的连贯积累性。

(2) 价值增值性。一定意义上,资本转换中的价值增值性,是一切资本积累和转换最为原始的基本动力。经济资本的价值增值是这样,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等,其价值增值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经济资本可以立即、直接转换成资金,而且这种转换是可以明确度量的。譬如大学所拥有的房产、土地等物质资本或自然资本,如果出售的话,可以按照市场价格直接换成数量适当的资金。而其它类型的资本虽然也可以转换成资金,但一般并不能即时发生。即使转换成了资金,具体额度也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譬如大学可以利用其社会资本进行筹资,但是向哪些网络关系筹集,能不能筹得,能够筹得多少等,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再譬如,大学所拥有的发明专利(学术资本),能否发生转换、谁来购买、能够转换多少等,也是不确定的。

(3) 成本耗散性。任何资本的积累转换都需要耗散一定的成本,成本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成本的分类多种多样,譬如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机会成本等等。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等较为容易理解,机会成本则相对抽象些。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当你选择A而不选择B时,你所放弃的好处。如果A能产生更大的效用,那么选择A当然是理性的,但这个决定必须要在参照了失去的机会成本时再做出的。<sup>②</sup>在资本多样性面前,之所以强调机会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虽然不像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样需要直接花费资金,但是如果选择不当,浪费的好处却可以超过获得的好处。譬如就学术资本而言,如果大学过度强调显性学术资本,激励教学科研人员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生产科研成果,那么就会挤占教学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教学工作中,从而影响到隐性学术资本为大学带来的价值,进而使大学培养人才的基本职能发生动摇。

(4) 价值多样性。布迪厄不断提醒我们,在资本的积累和转换中,必须反对两种既相对立却又同样偏激的观点:一种是经济主义的观点,它在最后的分析中总要将所有的资本类型简化为经济资本,从而忽略了使资本的其它类型产生特殊效果的东西;另一种观点是符号主义的观点,它总喜欢将社会交换简化为交往现象,因而忽略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所有的学科都有可能被简化为经济学。<sup>③</sup>简言之,在资本积累和转换中,不能完全注重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其他价值,同时又不能不关注经济价值。大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一定数量的资金支持可谓步履维艰。但是,制约大学发展的绝不仅仅是资金这一个方面,还有大学的学术声望、制度安排(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术自由、网络关系等等。当多元价值面临冲突时,大学就应当认真考量究竟何种价值更为重要。

## 2. 大学多样资本转换的途径

(1) 再生产。大学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反复地生产和积累多样资本。作为从事高深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组织部门,大学首先要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学术资本,譬如从一种知识创造另一种新知识,从自身知识向社会知识传播,并通过这些活动再生产自身的学术声望。除了大学学术资本的再生产,大学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其他资本形式也都存在着再生产。大学要不断积累资金、不断购置图书仪器等,再生产经济资本;要不断补充师生员工,日渐形成文化品牌,逐步完善体制机制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第3—4页。

② [美]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密尔的政治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③ [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第19—20页。

等,再生产文化资本;要不断调整内部网络关系,拓展发展外围等,再生产社会资本。除了大学单一资本类型的再生产之外,大学多样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再生产过程,而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大学今天建成的一座楼,百年之后就可能再生产为文化资本。大学发明的一个专利、创造的一个思想,不但可以再生产为经济资本,而且还能再生产为大学的文化资本等。

(2) 交换。虽然大学拥有多样资本,但是其生存和发展还需与外界不断进行资本交换。大学不是生产部门,维持其发展的经济资本主要通过外部交换才能获得。大学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都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换取外部经济资本。同时,大学多样资本与外界换取的绝不仅仅是经济资本,还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学术资本等等。大学所有外部利益相关者,都属于资本交换的对象。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大学资本交换对象是不同的。在中世纪时期,大学资本交换的对象主要是教会、世俗政权和市民等;19世纪以后,伴随教权日趋没落,世俗权力不断加强,大学逐渐发展为国家机构,大学资本交换的对象主要为政府;当下,全球范围内的趋势是,政府已无力包办大学,大学资本的交换对象也更趋多样。

(3) 转让和继承。所谓转让,是指个人(组织)把自己的东西(利益、权力等)转给其他个人(组织)。从转让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有偿转让和无偿转让。有偿转让的前提是获取利益,无偿转让(继承、馈赠等)的前提是不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从转让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产权转让、债权转让、资产转让、技术转让等。由于大学是一个以促进公共福祉为目的、非营利性组织,因此外界的无偿转让就成为大学多样资本转换的一个基本类型。回顾世界大学发展史,无论是政府部门、私人财团,还是宗教组织、杰出校友等,无偿转让给大学资产的案例比比皆是。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无偿转让,才使大学能够保障其公共福祉性。继承作为无偿转让的特殊形式,可分为继承自我和他者两种类型。大学自身资本的继承,可看作大学资本再生产的特例,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大学,其多样资本的继承是确保其发展的文化根基。对他者资本的继承,在大学发展中同样多见。譬如尽管经过50年代院系调整,私立、教会大学在中国本土消失,但是他们流传下来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仍然在现代大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3. 大学多样资本转换的方式

大学资本的转换方式多种多样。从内容来看,可分为经济转换和社会转换;从是否需要中介来看,可分为直接转换和间接转换;从手段来看,可以分为强制转换和诱致转换;从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内部转换和外部转换。

(1) 经济转换和社会转换。经济转换一般是能够以货币明确度量的,而且主要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譬如,1807年9月,威廉三世将拨给哈勒大学的所有经费,全部转拨给柏林大学;1809年7月,又将亨利王子(Prince Henry)的宫殿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同时拨款15万塔勒作为新建柏林大学的办学经费。<sup>①</sup>这一转换形式就是明显的经济转换。表面上看来,威廉三世并没有在转换中获得经济利益,但是在资助新建柏林大学之前,他曾说国家要用智慧的力量来弥补物质资源的损失。<sup>②</sup>换句话说,因普法战争(1806年)的失败,国王也想通过大学来振兴民族和国家。再譬如,大学明码标价出售自己的专利、转让自己的经济资本、收取大学学费等都属于经济转换的范畴。与经济转换不同,资本的社会转换是很难用货币明确度量。相对经济转换的透明性,社会转换具有高度模糊性。譬如,大学运用社会资本与外部建立广泛的网络合作关系,并不必然一味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还有他者的信任、肯

<sup>①</sup>C. E. McClelland, *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11—212.

<sup>②</sup>D. Fallon, *The German University: A Heroic Ideal in Conflict with the Modern World*, Colorado: 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9.

定、认可等,这些是很难通过货币来明确度量的。

(2) 直接转换和间接转换。所谓直接转换,就是无需任何中介、面对面的转换。威廉三世将拨款和王子宫殿赠予新建柏林大学就是一种直接转换,从国家经济资本直接转换为大学经济资本。就大学而言,直接将其经济资本出售、直接利用其文化资本获益、直接利用其社会资本筹资、直接利用其学术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等,都属于直接转换的形式。同样,直接转换并不必然是仅仅为了获得有形物品或者可度量的货币,也包括难以度量的信任、肯定等。所谓间接转换,就是需要第三者的介入方可实现的转换形式。成立于1919年的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扮演着英国大学和政府之间从学术资本到经济转换的中介角色。一般情况下,对于大学而言,资本的间接转换要比直接转换更为有利。因为大学不是企业,不擅长经商,相对于政府,更是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在讨价还价中如果有一个“缓冲器”(Buffer)介入,可以有效避免大学过度商业化的趋势,也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的学术自由与自治受到外部的直接侵害。但是,相对于间接转换,直接转换不需要花费更多成本,而且也更加高效便捷,所以无论是政府、企业,甚至是大学自身,也都热衷于直接转换。这也是1988年英国政府取缔大学拨款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动因。

(3) 强制转换和诱致转换。强制转换是指权力部门通过法律制度或命令等,自上而下推行的激进式转换。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导入前苏联模式,取缔全部私立、教会大学,打破原有大学格局,重新组建大学,并导入政治课程、辅导员制度等一系列变革,就属于强制转换的范畴。这种强制转换,不但改变了大学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而且学术资本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譬如,大学科学研究职能转移到新成立的科学院或社科院,新建大学的科学研究丧失殆尽;原有综合性大学被分割为农、林、矿、水、财经、体育等单科性院校,多学科培养人才的环境氛围荡然无存等。与强制转换不同,诱致转换是在获利机会的驱动下,个人或组织自发倡导,自下而上推行的渐进式转换。譬如,20世纪80年代,诸多单科性高校纷纷自发改为多科性院校;伴随计划经济模式解冻,科学研究的职能也逐渐进入大学,通过科研提高教学并提升学校办学层次和办学声望等,逐渐成为众多高校的共识。为充分发挥高校之间资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学术资本等)共享,避免专业重复设置,一些高校开始自发地调整、重组、共建等,这些均属于大学资本间的诱致转换。

(4) 内部转换和外部转换。大学作为组织,其内部具有多样资本,这些资本之间也可进行转换,即为内部转换。譬如,大学运用科研奖励、教学奖励等措施,激发教学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从而使经济资本转换为学术资本;大学运用经费修缮校园内的标志性建筑,使之逐渐演变为独具历史特色的文化资本;大学也可以出资召开学术会议,引进名家报告等,从而积累和增加自身的社会资本、学术资本等。与之相应,大学与外部(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等)发生资本转换,称之为外部转换。按照转换路径不同,大学资本的外部转换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①外部资本向大学资本的转换,譬如政府对大学的赠地拨款,企业、私人财团等对大学捐赠等。②大学资本向外部资本的转换,譬如大学帮助企业社区等解决技术难题、提升社区文化等。③大学内外部资本的交换,譬如企业为了增加利润,购买大学的技术支持,大学为了获取资金,出售自己的专利等。一般来说,前两种形式的共同特点是,资本转换途径是单向度的,且在主观上不以盈利为目的;第三种形式是双向度的,且在主观上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大学何种形式的资本转换,都是要受到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等)和非正式制度(道德规范、习俗惯例等)约束的。非法的资本转换自然会受到法律制裁;不合乎道德的资本转换,短期来说可能凑效,但是从长远来说造成的损失却可能是无法弥补的。



### 三、大学多样资本的重要意义

1. 强调资本多样性,可以解释大学发展中的诸多现象。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强调经济资本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如何解释中世纪大学在没有校舍、图书馆、实验室等情况下得以产生;又如何解释诸如西南联大等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弦歌不断、培养出大批知识、文化及管理精英;如果说我们仅仅强调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资本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又如何解释芝加哥大学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就可以成为堪与哈佛、耶鲁等百年历史名校比肩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样,又如何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中国人民大学,在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后,就成为国内众多高校效仿的高等教育重镇;如果说我们仅仅强调多元的社会资本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又如何解释19世纪德国大学在国家一元资助下,能够在欧洲大学中后来居上,占据世界高等教育之巅峰长达一个世纪!

毫无疑问,要解释以上大学发展中的典型案例,必须借用多样资本的视角。譬如,我们在解读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西南联大的生存和柏林大学的崛起时,离不开社会资本的视角。我们在解读中国人民大学能够迅速成为高等教育重镇,离不开政治资本的视角。作为私立的芝加哥大学,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的巨额资助,首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正是利用这巨额资金,遍访全美,寻找最好的教授。他从耶鲁大学聘来教授,并雇佣了几个前大学校长,包括威斯康辛大学校长。他在克拉克大学校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会见了大学很多教师,并承诺给出双倍工资。当校长提出抗议时,哈珀竟然邀请他一起加入芝加哥大学。最终,哈珀从克拉克大学挖走了15名教授。<sup>①</sup>从建校之初就大力延揽名师,并迅速走向卓越,哈珀的做法与19世纪初期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dt)创办柏林大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强调应当从资本的多样性来解读以上大学之发展,但是都离不开当时该大学所具有的崇高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无论是中世纪的巴黎大学,还是博洛尼亚大学;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柏林大学,还是20世纪的芝加哥大学;无论是解放前的西南联合大学,还是建国之初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大学组织都在相应历史阶段聚集了时代需求的高深知识,形成了同时代其他大学所追寻和效仿的学术声望。一言以蔽之,其他资本形式只是大学发展中的动力辅助,学术资本则是大学发展中亘古不变的基本底色。

2. 强调资本多样性,有利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自由是学术不断创新的灵魂,自治是大学持续发展的根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自欧洲中世纪以来就形成的大学理念。回顾世界大学史,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什么时候大学的学术自由不在,大学自治缺失,那么大学发展就会面临诸多危机;什么时候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能够相对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那么大学发展就会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良好态势。

当今大学,已不再是中世纪时期的学者社团,也不再是19世纪时期的精英机构,它需要面对多元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主要利益相关者,还是次要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内部利益相关者,还是外部利益相关者,这些团体和个人,都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大学的生存发展和目标实现。事实上,从中世纪学者行会产生之日起,大学无时无刻不为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牵制。当下大学面对的这些外部牵制则更为复杂多样。大学要想获得更为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自治,就必须不断积累自身的多样资本,从而增加与政府、企业、市民团体等讨价还价的砝码。大学不是企业工厂,不是商业财团,一味强调经济资本,必然会沦为其他组织的附庸。但是,当下大学又是运营费用巨大甚至是“烧钱”的机构,如果没有足够的运营经费,大学发展必然步履维艰。在现代社会环境里,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

<sup>①</sup> [美] 亚瑟·M.科恩、卡丽·B.基斯克:《美国高等教育的历程》(第2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高等教育组织,奢望大学自治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认为,一所大学的自治,首先要能够自行处理资金,面对全球范围内政府对大学资助的份额逐步减少,大学必须开拓多种筹资渠道,譬如公司企业、地方政府、慈善基金会、版税收入、校园服务收入、学费以及校友集资等。一个可以操作的20世纪大学自治的定义,是不依赖一个单一的狭窄的资助基地。<sup>①</sup>

大学自治是这样,学术自由亦如此。学者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商人,如果一味追求金钱,必然会沦为俯首帖耳的“犬儒”,这时候再谈学术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是,学者也要有基本的生活需求,最好是能够体面地生活。从资源依赖理论来看,如果靠单一的组织或个人资助,其依赖程度越强,自身的自由空间会越小。反之,如果依赖于多个组织或个人,那么自身可选择性和自由空间就会越大。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能够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由,就是能够利用自由迁移等,有效游离于教权、王权和市民之间。待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的传统大学,或沦为教会统治的附庸,或沦为世俗统治的羔羊,学术自由也就几乎荡然无存了。

我们在哀叹政府对大学资助减少,在抱怨外部对学术自由侵蚀的时候,更应该想一想大学自身应该凭借什么、依靠谁和怎样依靠等问题。从经济资本来看,现代大学已经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既无基本校舍,也无图书馆、实验室等固定资产,保住教学、研究和生活的底线已经不成问题,部分一流大学甚至富可敌国;从文化资本来看,经过多年积累,大学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和制度文化,这些文化形态是保障大学共同体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社会资本来看,多元利益相关者恰恰为大学形成多元资助,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从学术资本来看,大学作为传承、创新、应用高深知识的组织部门,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当下大学可以凭借的价值形式多样,可以依靠的对象也不断拓展。当下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次第兴起,就是大学多样资本联合运作的鲜活例证。

3. 强调资本多样性,有利于大学以学术为业。面对纷繁的社会世界和多样的资本类型,大学发展路在何方?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每一个社会部门组织的存在都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有所不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医院都不会去卖鞋,也不会大规模进军教育领域,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照顾病人。他忠告,永远不要为了金钱而放弃自己的使命。<sup>②</sup>使命不但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而且还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

何谓大学使命?红衣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开篇提到大学“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sup>③</sup>。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在《大学的使命》一书中,将大学必须行使的职责概括为:文化的传授、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sup>④</sup>在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那里,大学已经是“一个有着若干灵魂的不一致机构”,但是,他认为大学“在保护、传播和探究永恒真理方面,它没有什么同道;在探寻新知识方面没有在世的同道;在整个历史上服务于那么多先进文明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也没有同道”,“虽然它没有一个属于自身的单一灵魂,但它的成员献身于真理。”<sup>⑤</sup>可见,尽管纽曼、加塞特和克尔对大学使命表述各异,但同时代的高深知识,却是其共同元素。传承、探究、创新和应用高深知识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独特使命。

面对多样资本,大学要牢记使命,不为金钱而丢失自己的灵魂。因此,相对经济资本,以高深知识为主体的学术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对于大学尤为重要。秉持学术资本不被异化,确保学术声望不被损耗,坚持以学术为业,大学之树才能常青。这对于大学内的基础学科如此,对于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同

① [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② [美]彼得·德鲁克:《组织生存力》,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41—45页。

③ 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Third Edition)*, London: Basil Montagu Pickering, 1873, p. ix.

④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⑤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26页。

样如此。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首要使命是运用高深知识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如果商学院教师职责主要是商人,医学院教师职责主要是医生,法学院教师职责主要是律师,他们不是以学术为业,那么教师将无资格再称其为教师,大学也无资格称其为大学。

4. 强调资本多样性,可以规避学术资本主义盛行。当下,为应对高等教育经费危机,公司文化愈来愈多地融入大学,学与商的博弈日渐蔓延,以绩效为目标的大学管理不断冲破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大学为谋取更多经济利益,不断将学术资本进行外部交换,其交换的广度、深度也日益扩大。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交易价值(exchange value)强烈冲击着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大学课程设置日益受到以市场为预期的实用性价值引导,强调培养追求社会公正、辨别真善美等伦理价值的文科课程逐渐被压缩到底限或者被排挤到边缘。<sup>①</sup>与之相伴,在大学学术研究中,从事纯粹理论研究的热忱不断降低,对于没有明显实用性的学术工作,习惯地表现出不耐烦的急躁情绪,学术转向了一个更具有物质功利性,更加朝生暮死地追求短期效益的急切事务。<sup>②</sup>这些在大学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中的表现,都是过度追逐经济资本、消耗学术资本的典型现象。

众所皆知,学术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其他资本形式一样,具有两重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学术资本如果运用不当,同样会为大学或教师发展带来困境。应当说,学术资本是大学或教师进行外部讨价还价的基本砝码,如果弃之不用,躲避在象牙塔内,无疑会被经济社会发展所抛弃。中世纪后期大学无用论的呼声甚嚣尘上,就是最好的注脚。但是,大学或教师如果将学术过度资本化,也就是说,始终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那么必然衍生为学术资本主义,从而使大学丢失其基本的职责和灵魂,最终受到伤害的必然是大学或教师自身。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强调大学资本的多样性,就是要强调大学学术资本在多样性中的基础性,大学不能为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动摇了学术资本的根基;强调大学资本的多样性,就是要强调大学学术资本在外部交换中的长效性,大学不能为追求眼前利益,而放弃关乎自身生死存亡的使命;强调大学资本的多样性,就是要强调大学要始终警惕学术资本主义泛滥,积极培育大学多样资本的土壤,不为物欲横流所淹没。

(责任编辑:程天君)

## The Diversity of University Capitals: Their Basic Types, Conversion and Significance

HU Qin-xiao

**Abstract:** A university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ts various capitals, promote its academic freedom and autonomy, and persevere in scholarly research despite the reduction of government funds for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Conversions can be realized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a university possesses, namely economic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academic capital. The primary features of interconversions among various university capitals are their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value growth, cost dissipation and value diversity. The basic ways of the convers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s include reproduction, interchange, transfer and inheritance. The types of conversion ar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versions; directive and indirect conversions; forced and induced convers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versions. It is the constant conversions of various capitals that make a university more vigorous, stronger and more innovative.

**Key words:** university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cademic capital

① [美]埃里克·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② [美]索尔斯坦·凡勃伦:《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81页。